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

冼星海



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

冼星海

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柳成荫

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

冼星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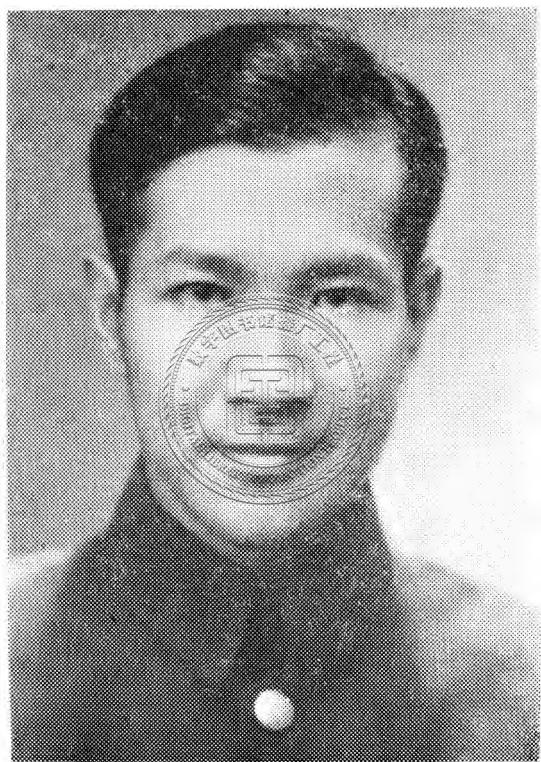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0千文字 4.125印张
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4,500册
书号：8026•3689 定价：0.41元





为人民的音乐
冼星海
志致
无涯



有抗战必胜信心，
为大众谱出歌声！

星海同志

星海

4.14.7.11.

于延安



出 版 说 明

近年来，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，要求出版冼星海的有关文字资料。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本书。书中收集了冼星海写的《我学习音乐的经过》、《创作札记》、部分音乐论文和几封书信。

编辑这本书，主要根据以下几种材料：

一、《冼星海专辑》(一)、(二) (内部资料，1962年由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黄翔鹏、齐毓怡编)；

二、《人民歌手冼星海》(丘远编，1949年12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发行)；

三、《人民音乐》1955年第八、九、十期；

四、《新音乐》第五卷第三期(1942年2月1日出版)。

我们在文字和标点符号方面作了一些校订工作。本书的注释，凡标有⊗*符号的，是《冼星海专辑》一书中的注释；冼星海自己的注释，用“原注”标出；其余注释为本书编者所加。

本书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、徐士家两位同志的大力帮助，做了许多具体的编辑、校订工作。特此表示感谢。

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七九年

目 录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	(1)
创作札记	(20)
写给党组织的信	(83)
写给母亲的信	(86)
致洛阳歌咏队的信	(90)
普遍的音乐	(92)
悼亡师保罗·刁客士	(94)
救亡歌咏在洛阳	(99)
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	(101)
在抗战中纪念聂耳	(102)
《反攻》歌曲集自序	(104)
为什么研究民歌	(107)
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	(113)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*

李凌兄：

我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。现在又是春天。每年春天，我总想多写些东西，而今年春天，怕还能更多写一些吧。我刚刚写完《三八妇女节》歌舞活报、《牺盟大合唱》，又要开手写《潞阳河》歌剧和《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合唱》……。

我住的地方是在一条小溪流入一条河的山沟边，春天冰雪融化了，河水溪水浓重地、磅礴地向东奔流。在柳树枝头抹着苔绿的包围里，礼堂——从前是个教堂——的双塔尖插在明秀的天空，引起了异国的回忆，我想起你前次的来信。

你问起我的创作经验，我觉得我还谈不上什么经验，因为现在我也还在学习中。但为了感谢你给我的鼓励，只好不避厚颜将学习的经过乱七八糟地写下来，这样的东西，怕于你没有什么益处吧！

一、在 巴 黎

我曾在国内学音乐有好些年。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候

* 本文是冼星海同志应李凌同志之约而写的。最初发表于《新音乐》月刊1940年第二卷第三期。

候，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，很想到法国去。同时，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，成功为“国际的”音乐家。正在考虑之际，凑巧得×××兄的帮忙，介绍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奥别多菲尔(Paul Oberdoeffler)给我，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不顾自己的穷困，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。到了巴黎，找到餐馆跑堂的工作后，就开始跟这位世界名提琴师学提琴。奥别多菲尔先生，过去教×兄时，每月收学费二百佛郎（当时约合华币十元左右）。教我的时候，因打听出我是个做工的，就不收学费。接着我又找到路爱日·加隆(Noel Geallan)先生，跟他学“和声学”、“对位学”、“赋格曲”(Fugue，一种作曲要经过的课程)。加隆先生是巴黎音乐院的名教授，收学费每月也要二百佛郎，但他知道我的穷困后，也不收我的学费。我又跟“国民学派”士苛蓝港·多隆姆(唱歌学校——是巴黎最有名的音乐院之一，与巴黎音乐院齐名，也是专注重天才。与巴黎音乐院不同之处，是它不限制年龄。巴黎音乐院则只限廿岁上下才有资格入学。此外，它除了注意技巧外，对音乐理论更注意)这个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(V.d'Indy)学作曲，他算是我第一个教作曲的教师。以后，我又跟里昂古特(Lioncourt)先生学作曲。同时跟拉卑(La bey)先生学指挥。这些日子里，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，生活穷困极了，常常妨碍学习。

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，而且求救无门。在找到了职业时，学习的时间却又太少，在此时期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，像餐馆跑堂，理发店杂役，做过西崽(boy)，做过看守电话的佣

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。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，看看谱，练习作曲。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，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，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，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，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。有一次，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，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，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，因为晕眩，连人带菜都摔倒，被骂了一顿之后，第二天就开除了。我很不愿把我是一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同事们，甚至连老板也不告诉，因此，同事对我很不好，有些还忌刻我，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给我做，还打骂我，因此我也常打架。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，他看见我学习时，总是找出事来给我，譬如说壁上有丝尘，要我去揩等等。但我对他很好，常常给他写信回家（东北），他终于感动了，对我特别看待，给我衣服穿等等。可是我还不告诉他我入学的事。

我失过十几次业，饿饭、找不到住处，一切的问题都来了。有几次又冷又饿，实在支持不住，在街上软瘫下来了。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。幸而总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，这些人是些外国的流浪者（有些是没落贵族，有些是白俄）。大概他们知道我能弹奏提琴，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弹奏，每次给一二百佛郎，有时多的一千佛郎。有对白俄夫妇，已没落到做苦工，他们已知道了劳动者的苦楚，他们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——请我吃饭。我这样的过朝挨夕，谈不上什么安定。有过好几天，饿得快死，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、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，忍着羞

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，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。把钱扔到地下，但又不得不拾起。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，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，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（其实不是为了学习，倒是个活路）。有一次讨钱的时候，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，掌我的颊，说我丢中国人的丑！我当时不能反抗，含着泪，悲愤得说不出话来——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不喜欢我，他们都很有钱，还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，但却不借给我一文。有时，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，但他们把门闭上，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（男的、女的）。

我忍受生活的折磨，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，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，幸而教师们肯帮助我，鼓励我，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，常送我票。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他的提琴独奏（Thais）时，不厌我穷拙，给我坐前排。这些对我意外的关怀，时时促使我重新提起勇气，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。我的学习自己觉得逐渐有些进步，我写了好多东西，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。

在困苦生活的时日，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。

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“贞德节”的大游行。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日，纪念的那天，参加的人非常拥挤。有整齐的步兵、卫队、坦克队、飞机队等。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，三色国旗飘扬。我每次都很感动。在1932年，东北失陷的第二年，到那些节日，我照例去看游行。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，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，猛烈地打动了。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，

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、无助、孤单、悲痛、哀怨、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，我两眼充满了泪水，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。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。

我那时是个工人，我参加了“国际工会”。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有一些照片。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，看到了流离失所、饥饿死亡的同胞；看到了黄包车（人力车）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；看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分裂，国民党的大屠杀，……这些情形，更加深我的思念、隐忧、焦急。

我把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，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。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（这是“学院派”艺术至上的特点）用来描写、诉说痛苦的人生、被压迫的祖国。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。在初到法国的时候，我有艺术家的所谓“慎重”，我对于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，或者一年写一个东西，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《索拿大》，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功夫。但以后，就不是这样了。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《风》的时候，正是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破了，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，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，我没有棉被，睡也睡不成，只得点灯写作，那知风猛烈吹进，煤油灯（我安不起电灯）吹灭了又吹灭。我伤心极了，我打着战，听寒风打着墙壁，穿过门窗，猛烈嘶吼，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。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、辣、辛、酸、不幸，都汹涌起来。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于是